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劉師培

儒學論集

劉師培 著
黃錦君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劉師培

儒學論集

劉師培 著
黃錦君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高慶梅
責任校對:何 靜
封面設計:墨創文化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師培儒學論集 / 劉師培著;黃錦君選編.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0. 4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ISBN 978-7-5614-4792-5

I. ①劉… II. ①劉…②黃…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5815 號

書名 劉師培儒學論集

著	者	劉師培
選	編	黃錦君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4792-5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張	30.75
字	數	6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 001~1 500 冊
定	價	95.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
聯繫。電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總 序

編委會

—

儒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孕育於古老的中國文化，也深刻地影響和作用於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社會。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形成“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志》）的儒家學派，開啟了古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軸心時代”。儒家創立伊始，

即以“仁義”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以“順陰



認識中國的古代社會。

戰國時期，孟、荀繼起，“學”、“思”二派，角力爭先，或暢言“仁義”，或肆談“禮樂”，儒學思想體系和理論構建漸趨完備，於是儒學成為領先諸子而又啟迪諸子的一代“顯學”。繼而秦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儒學遭遇禁錮，儒生備受打擊。漢初布衣將相，厚重少文，崇尚“黃老”，實行“無為”，儒學於是一度消沉。至董仲舒、公孫弘出，儒學包容諸子而又取代諸子，頓顯其治國安邦、訓世覺民之新姿態。漢武帝推行積極有為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遂成為當世“國教”，儒家“忠孝”、“禮義”、“仁民”、“愛物”等理念逐漸滲入政治、經濟等民生領域，發揮其端正民心、諷喻世教的作用。自此之後，兩千餘年，後儒沿波，各呈意態，直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是指導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倫理的指南北斗。儒家學說作為中華學術的主流和正宗，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和科舉選士的主體內容。從中央的太學（或國學），到地方學府（府學、州學、縣學）和民間書院，儒家經典及其思想都得到了認真傳授和大力闡揚。誦習儒家經典，踐履儒家倫理，提倡忠孝仁義，服膺《詩》、《書》、《禮》、《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追求君子人格，實現信義和平就成了歷代有識之士矢志追求的理想人生，也為民衆樹立了判斷是非的千古不易的準繩。

一部中國歷史，既是儒學不斷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歷史，也是儒學在這一歷程中接受各種文化回饋、應對各種需求（甚至挑戰），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歷史。歷代統治者，無論是出於維繫萬世基業的需要，或是出於治世牧民的考慮，大多繼承和發展了自西漢以來形成的以太學（或國學）、郡國府州縣學傳播儒學，以察舉或科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並對儒經的闡釋、儒學理論的發展、儒家學說的實踐，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貫徹，傾注心力，提供條件，形成了風格獨特、千古一系的以儒學文獻、儒家經學、儒家學術、儒學思想、儒學文化、儒學倫理等為內容的有機學術體系，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和中堅。儒學在教育士子、鑄造民族性格、豐富祖國文化、形成中國特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儒學，既是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統思想和實踐倫理，也是自身具有系統理論、豐富內涵和博大文獻的經典之學、系統之學。它既是治術和學術，也是政典和教典；既是中國人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國人的主體思維。它與佛、道二教以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一道，構成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自兩漢以迄晚清，概莫能外。回顧歷史，服務未來，作為中華裔裔的當代學人，又焉能妄自菲薄，數典忘祖！

二

歷史降至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儒學一花獨盛的歷史瞬間成為明日黃花。列強進逼，“西學”東漸，中華民族信守了兩千餘年的核心價值觀念搖搖欲墜，

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園也隨之分崩離析。孔廟被拆，書院轉制，尤其是民國初年全盤接受西方教育體制，儒家經學從教學計劃中被刪除，儒家思想在學術領域被批判。從此之後，中國的教育界很難看到儒家經學那熟悉的身影，中國的學術史上也再沒有儒家神聖的地位。漸漸地，也是令人痛心，中國儒學被醜化，被虛化，被肢解，甚至被遺忘。更有甚者，儒家經典被指為偽書，儒學文獻被誣為垃圾，儒學倫理被拋諸腦後，儒家學說被掃地出門，實為空前所罕見、亙古之未有！中國儒學在自己的國度裏頓時成為游魂野鬼，了無“血食”、“寄身”之所！現行的所有學科設置、圖書分類和項目管理體系中都沒有中國儒學的地位！

回顧二十世紀與中國儒學有關的學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對儒學及其經典持懷疑和反省態度的“疑古派”；二是對儒學及傳統文化抱反對和決絕態度的“反孔派”；三是對儒學抱發展和改造態度的“新儒家”；四是突出儒學的信仰價值，必欲變儒學為宗教的“孔教派”；五是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純學術研究的“研孔派”。

“疑古派”和“反孔派”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經是中國學術的主流，至六七十年代“文革”時達於高潮。他們非毀詩書、鄙視仁義、拋棄禮樂、懷疑經典、批判聖賢、叛離傳統，視儒學為一切腐朽落後的總代表，恨不得將儒家經典“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在對待“中國儒學”學科建設和學術傳承與發展等方面，自然不感興趣。他們之中雖然不乏“著作等身”之人，但從建設角度看，卻是“風疾馬良，去道益遠”，南轅北轍，乏善可陳。

出於對疑古、反孔的反動，“新儒家”運用近代西方思想學術來更新儒理、發展儒學，必欲使儒學適應並服務於當代和未來社會，此亦古來儒學發展未有之新境界，從而促進了儒學學理的自身建設。“孔教派”從宗教的角度審視和發展儒學，他們借鑒西方宗教理念，必欲將儒家發展成儒教（或孔教），對加強儒學信仰、完整保存儒學自身體系有所助益。“研孔派”則從純學術史角度，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研究和考述，對認識儒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狀況大有裨益，客觀上為恢復“中國儒學”的完整性提供了幫助。下面即簡述後三派的主要活動。

二十世紀初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儒學遭受空前大難，雄峙東方兩千餘年的儒學大廈轟然坍塌，儒學統治中國的時代遽然終結，嚴格意義上“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的傳統儒家已經不復存在。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梁漱溟等人挺身而出，為孔子辯護，揭起儒學復興的旗幟，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前驅。隨後，經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以及馮友蘭、賀麟等學人的不懈努力，“現代新儒學”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在學理上帶來了儒學的革新，形成“新理學”、“新氣學”、“新心學”、“新實學”等新儒家學派，大大提昇了民族自信心，為當時的民族自強以及隨之而起的抗日救亡運動注入了新鮮空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去市場，於是轉移至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延續其生命，主要代表人物有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等。他們以接續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有感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他們深情地呼籲：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應該完好地保留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國民精神。他們著書立說，四處講學，身體力行，宣傳儒理，在世界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最具影響的活動是共同簽署和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即“中國文化宣言”。

七八十年代，是現代新儒學的復興期。從1980年起，後現代主義思潮流行，認為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等片面強調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和對人的終極關懷，有損於人類幸福和長久和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儒家資本主義”概念的流行。中國大陸蠻橫無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陸部分學人與香港、臺灣地區現代新儒家聲氣相通，從而推動現代新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不管其政治主張如何，現代新儒家積極謀求儒學現代更新，主張中華文化的自我本位，喚醒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為儒學現代更新和發展作出了積極思考，這無異於使儒學這棵千年古樹催生出無數新枝嫩芽，展現出無限生機和光明前景。

“孔教派”從觀念上講，往前可以追述到明末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後引起的中西文化和信仰之爭，而“孔教”一詞的正式提出則始於二十世紀初廖季平、康有為、陳漢章等人。廖氏出於對孔子的尊大，正式發表《孔教哲學發微》，提出以孔教統天下一切學術；康氏則有感於維新變法失敗、西學大量東漸，以為是中國缺乏宗教信仰所致，於是發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認為定孔教為國教，使“人心有歸，風俗有嚮，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其弟子陳漢章等人起而和之，成立孔教學會和孔教學院，於是“孔教”形成一時熱門話題。至八十年代，任繼愈先生再提儒教問題，其弟子李申更撰著《中國儒教史》、《儒學與儒教》、《中國儒教論》等系列專著，將這一討論推向深入。這一問題在海外也有激烈的爭論，至今方興未艾，其觀點也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他們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具有超越性和終極性，也具有其他宗教性因素，在中國歷史上起到過宗教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儒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它只是道德教、人文教，肯定儒學仍然有現代意義。當然，也有人認為儒學是封建社會的宗教，已經成了博物館的歷史收藏物，從而否定儒學仍然具有現代意義。

“研孔派”則多半是在儒學信仰得不到滿足情況下的轉型，章太炎曾論清學曰：“多忌，故歌詩文史楷；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研孔派”的作為正與之相似，不過

不是“說經”，而是“說史”了。這一派中，老一代學人如蒙文通、白壽彝、金景芳、張岱年等先生，大多走過“由經學而史學”的道路，他們早年在儒家經學、孔學、易學以及宋明理學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隨着經學學科退出歷史舞臺以及近代教育的轉型，這批學植深厚的專家學人，不得不將精力轉入純歷史的或儒學史、經學史的研究，角色也從當初的信孔、尊孔轉為研孔，即使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不忘為孔子和儒學說幾句公道話。改革開放後，從1979年始，在中國大陸逐漸形成研孔熱潮。1985年在中華孔子研究所（中華孔子學會的前身）成立會上，張岱年慎重宣佈：“盲目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批孔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此後研孔文章日益湧現，研究專著越來越多，特別是具有革命家、教育家雙重身份的匡亞明先生出版了《孔子評傳》，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嚴密的邏輯、新穎的見識、深刻的分析，塑造了孔子這位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形象，實開啟正面研究儒學之先聲。此後同類的著作有：綜合性的如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中國儒學辭典》，劉蔚華等《中國儒學思想史》，龐樸主編《中國儒學》等；專題專經性研究，則有金景芳《學易四種》、《孔子新傳》（合著），劉起鈞《尚書學史》，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等，對儒家經學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總結。

特別是二十世紀後期，一批年青學人登上學術舞臺，在專門學術史研究方面做出可喜的成績，出版了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廖名春、梁韋弦、康學偉《周易研究史》，洪湛侯《詩經學史》，趙伯雄《春秋學史》，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姜林祥、王鈞林等多卷本《中國儒學史》，等等。真是後來居上，異軍突起，斐然可觀。這些著作既是對儒家學術史的研究，也是對儒學學科整體形態的呈現，為儒學學科的恢復提供了歷史的和學術的支撐，為儒



1997年四川大學啟動《儒藏》編纂工程，在儒學文獻系統整理和獨立體系構建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四川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為適應儒學人才培養的需要，還籌劃和組織了“儒學教材”的編纂，一套全面反映儒家經典、儒學歷史、儒學思想、儒學文獻、儒學文化以及儒學文選的系列教材正在醞釀之中。它們的編成和出版，必將對儒學的復興和再度興盛起到積極的作用。

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經預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倒回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既然人類有此需求，儒學在二十一世紀也就有了復興的理由和希望。儒學學科的回歸和重振，應該指日可待，為期不遠矣！套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儒學復興“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儒學具有合乎人性、潤乎人心的系統理論，其追求社會和諧、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無疑具有超乎國家和種族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儒學自身具有兩千五百年的發展歷史，我們對儒學的再度復興沒有理由不抱樂觀的態度。

當然，這種可能也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所說只是“快要”而已，其間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去走，包括對儒學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研究，對儒學成果進行完整的收集和整理，對儒學學科體系進行全新的重組和構建，等等。我們正在從事的《儒藏》編纂和研究事業，正是一部收集和整理儒學發展歷史和學術成果的大型叢書，它收錄了上自先秦、下至清末的儒學成果和史料，可為儒學的當代復興和發展提供最齊全的資料。

如果說《儒藏》反映的還是儒學古代成就的話，那麼這套“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則是《儒藏》的續編，它是一部收集和整理近代、現代儒學研究成果的資料寶藏。其作者包括部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人，也有個別作者跨入了二十一世紀，但其成果主要發表在二十世紀之中。本文庫所收錄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成果，上可與《儒藏》相銜接，下可啟二十一世紀儒學發展之新知。它是承上啟下的橋梁，也是溫故知新的土壤。

二十世紀，風起雲湧，世事變遷，靡有常態。大致說來，前半葉天造草昧，雲雷混沌，由於世勢日非，國是莫定，文化陵夷，儒學自然不振；後半葉處於新舊體制交替之中，缺乏經驗，文化重建創新不足，優秀傳統繼承不夠。整個二十世紀，除了改革開放後二十年儒學稍有重振氣象外，儒家與經學，不是被打倒和誣詆，就是被忽略和荒廢。幸而尚有一批有學識、有良知的老前輩，仍然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耕耘不輟，猶如萬綠叢中的一點丹紅，使傳統儒學領域尚存幾許生機，不致一片荒蕪。這是中國文化之幸，中國歷史之幸，也是後學晚生綿綿瓜瓞、薪火傳承之大幸！收集整理、總結研究這些成果，回想這些碩學大師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仍然堅守儒學的精神家園，其成果可資借鑒，其精神更是令人欽佩！後之繼起者，當以此為階梯奮力前行！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編委會

主 編：舒大剛 吳洪澤 尹 波

編 委：(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 川	王小紅	王玉德	王智勇
李文澤	李冬梅	李宗桂	吳懷祺
邱進之	周國林	郭 齊	陳恩林
黃開國	黃錦君	彭 華	單 純
楊世文	蔡方鹿	廖名春	

秘 書：王小紅 張尚英

目 錄

國學發微	(1)
周末學術史序	(36)
漢宋學術異同論	(79)
南北學派不同論	(90)
漢代古文學辨誣	(112)
識緯論	(141)
古學起原論	(144)
古學出於史官論	(151)
補古學出於史官論	(155)
古學出於官守論	(160)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說	(173)
近儒學術統系論	(175)
清儒得失論	(180)
近代漢學變遷論	(187)
讀《左》劄記	(189)
《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	(204)
古《春秋》記事成法考	(222)
孔子作《春秋》說	(223)
《春秋》三傳先後考	(225)
《左氏》不傳《春秋》說	(227)
周季諸子述《左傳》考	(228)
左氏學行於西漢考	(230)
六經殘於秦火考	(235)
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237)
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252)
近儒學案序	(279)
習齋學案序	(282)
幽蓟顏門學案序	(284)
并青雍豫顏門學案序	(285)



東原學案序	(287)
王艮傳	(295)
劉永澄傳	(299)
顏李二先生傳	(305)
朱澤澧傳	(307)
汪紱傳	(310)
戴震傳	(314)
崔述傳	(318)
田寶臣傳	(321)
戴望傳	(324)
六儒頌	(327)
氏姓學發微	(329)
理學字義通釋	(338)
釋儒	(362)
政治名詞起原考	(364)
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366)
中國文字流弊論	(384)
經學教科書	(387)
劉師培生平及學術綜述	黃錦君 (413)
劉師培著述筆畫檢索	黃錦君 (451)

國學發微^①

序曰：詮明舊籍，甄別九流，莊荀二家尚矣。自此厥後，惟班《志》集其大成。孟堅不作，文獻誰徵？惟彥和《雕龍》，論文章之流別；子玄《史通》，溯史冊之淵源，前賢傑作，此其選矣。近儒會稽章氏，作《文史通義》內外篇，集二劉之長，以萃匯諸家之學術，鄭樵以還，一人而已。予少讀章氏書，思有賡續，惟斯事體大，著述未遑，近撰一書，顏曰《國學發微》，意有所觸，援筆立書，然陳言務去，力守韓氏之言，此則區區之一得也。

近世巨儒，推六藝之起原，以爲皆周公舊典，章氏實齋之說。吾謂六藝之學，實始於唐虞。卜筮之法，出於《周易》，而《虞書》有言“枚卜功臣”，又曰“卜不襲吉”，則《易》學行於唐虞矣。夫子刪書，始於唐虞，即《堯典》以下諸篇是也，則《尚書》作於唐虞矣。《息壤》之歌，作於堯世；《南風》之曲，歌於舜廷，則風詩廢於唐虞矣。虞舜修五禮，即後世吉凶軍賓嘉之禮也；伯夷典三禮，即後世天地人之禮也，則古禮造於唐虞。后夔典樂教育，特設樂正專官，而韶樂流傳，至周末墜，則樂舞備於唐虞。《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五帝之書”即唐虞之史也，則《春秋》亦昉於唐虞。蓋孔子者集六藝之大成者也，而六藝者又皆古聖王之舊典也，豈僅創始於周公哉！

《史記》言孔門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又曰世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夫六藝者，孔子以之垂教者也，然例之泰西教法，虛實迥別，學者疑焉。予謂六藝之學，即孔門所編訂教科書也。孔子之前已有六經，然皆未修之本也；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未修之六經易爲孔門編訂之六經。且六經之中，一爲講義，一爲課本。《易經》者，哲理之講義也；《詩經》者，唱歌之課本也；《書經》者，國文之課本也；兼政治學。《春秋》者，本國近事史之課本也；近日泰西各學校，歷史一科，先授本國，後授外史，而近代之事較詳，古代之事較略。孔子爲魯國人，故編魯史，且以隱公爲始也。《禮經》者，倫理心理之講義及課本也；《儀禮》爲古禮經，大抵爲孔門修身讀本。而《禮記·禮運》、《孔子閒居》、《坊記》、《表記》諸篇，則皆孔門倫

① 此處所選劉師培著述，皆以《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1997）爲底本進行標點整理。



理學、心理學之講義也。《樂經》者，唱歌之課本，此樂之屬於音者。及體操之模範也。此樂之屬於舞者。是為孔門編訂之六經。然六經之書，舍孔門編訂諸本外，另有傳本，如墨子等所見之六經是也。見墨子書中。至於秦漢所傳六經，悉以孔門刪訂本為主，故史公言“六藝折衷於夫子也”。折衷者，即用孔子刪定本之謂也。自孔子刪訂之本行，而六經之真籍亡矣。

孔子學術，古稱儒家，然九流術數諸學，孔子亦兼通之。觀《漢書·藝文志》之敘名家也，引孔子“必也正名”之語；敘縱橫家也，引孔子“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之言；敘農家也，引孔子“所重民食”之詞；敘小說家也，引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之文；敘兵家也，引孔子“足食足兵”之說，以證諸家之學，不悖於孔門。然即班《志》所引觀之，可以知孔子不廢九流矣。且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孔子兼明道家之學；作《易》以明陰陽，則孔子不廢陰陽家之學；言殊塗同歸，則孔子兼明雜家之學；言審法度，則孔子兼明法家之學；韓昌黎言孔墨兼用，則孔子兼明墨家之學。故孔學末流，亦多與九流相合。田子方受業於子夏，子方之後，流為莊周，而孔學雜於道家；禽滑釐為子夏弟子，治墨家言，而孔學雜於墨家；告子嘗學於孟子，見趙岐《孟子注》。兼治名家之言，而孔學雜於名家；荀卿之徒，流為韓非、李斯，而孔學雜於法家；陳良悅孔子之道，其徒陳相有“為神農”之言，而孔學雜於農家；曾子之徒，流為吳起，而孔學雜於兵家。由是言之，孔門學術大而能博，豈儒術一家所能盡哉！昔南郭惠子告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

古代學術，操於師儒之手。《周禮·太宰職》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是為師儒分歧之始。儀徵阮先生雲臺曰：“孔子以王法作術，道與藝合，兼備師儒。”《國史·儒林傳序》。吾謂阮說甚確。孔子徵三代之禮，訂六經之書，徵文考獻，多識前言往行，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儒之業也。孔子衍心性之傳，明道藝之蘊，成一家之言，集中國理學之大成，凡《論語》、《孝經》諸書，《論語》、《孝經》，皆孔子倫理學、政治學之講義也。皆師之業也。蓋述而不作者，為儒之業；自成一書者，為師之業。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言者也，是為宋學之祖；立身行道，曾子之學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傳為子思之學。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傳為孟子之學。《曾子》十篇存於《大戴禮》，《中庸》、《坊記》、《緇衣》存於《小戴禮》，取之以合《孟子》，而孔、曾、思、孟之傳定矣。此宋儒學術之祖也，然皆曾子之傳。子夏、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為漢學之祖。故孔學者，乃兼具師儒之長者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殆以此與。

班氏之言曰：“時君世主，好惡無方，是以九家之說，蠡起並出。”由班《志》所言觀之，則諸家學術悉隨時勢為轉移。昔春秋時，世卿擅權，諸侯力征，故孔子譏世卿，見《公羊》。惡征伐。如《春秋》於諸侯征伐必加譏貶是也。墨子明《尚賢》，著《非攻》，皆救時之要術，而濟世之良模也。雖然，孔墨者，悲天憫人之學也。殆其說不行，有心人目擊世風日下，由是閱世之義易為樂天，

如莊、列、楊朱之學是也。及舉世渾濁，世變愈危，憂時之士知治世之不可期，由是樂天之義易爲厭世，如屈宋之流是也。而要之皆周末時勢激之使然。雖然，此皆學術之憑虛者也。有憑虛之學，即有徵實之學。戰國之時，諸侯以併吞爲務，非兵不能守國，由是有兵家之學；非得鄰國之援助，則國勢日孤，由是有縱橫家之學；非務農積粟不能進攻，由是有農家之學。是則戰國諸子皆隨時俗之好尚，以擇術立言。儒學不能行於戰國，時爲之也；法家、兵家、縱橫家行於戰國，亦時爲之也。《墨子》言：“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戰國學術之最趨時者也。然學術之趨時者，亦不僅墨學一家也。古人謂學術可以觀時變，豈不然哉。

宋儒陸子靜有言：“獨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而周末學術，則悉失獨立之風。古禮有言，必則古昔，稱先生，儒家者流力崇此說。如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即諸子百家亦然，如墨子託言大禹，莊子稱墨子之言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孫淵如作《墨子序》，亦言墨學出禹。老子託言黃帝，故世並稱黃老。許行託言神農，以及兵家溯源於黃帝，醫家托始於神農，與儒家托言堯舜者正相符合。蓋諱其學術所自出，而託之上古神聖，以爲名高，此雖重視古人之念使然，亦由中國人民喜言皇古，非是則其說不行。自是以還，是古非今，遂成習尚矣。

《韓非子·顯學》篇有言：“孟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所言，有“子游氏之賤儒”，有“子夏氏、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亦云：“相里勤之子弟五侯之徒，南方之儒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爲別墨。”又言：“以堅白同異之辨相加，以簡偶不經之辭相應。”觀於諸子之言，則儒墨之道源遠益分，失孔墨立言之旨，即有之勿失者，亦鮮發揮光大之功，此學術之所以益衰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論諸子學派頗詳。即《荀子》所言觀之，知周末諸子之學派，多與西儒學術相符，比較而觀，可以知矣。《荀子》之言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案：它囂、魏牟，蓋道家之派也，而尤近於莊列。荀子稱其“縱情性，安恣睢”，其語雖爲過實，然足證此派學術以趨樂去苦、逍遙自適爲宗，故流爲放浪。吾觀希臘人伊壁鳩魯，創立學派，專主樂生，以遂生行樂、安遇樂天爲主，而清淨節適，近於無爲。近世英人邊沁繼之，遂成樂利學派，殆它囂、魏牟之流亞也。《荀子》又曰：“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鱣也。”案：陳仲、史鱣，蓋墨家、道家二派相兼之學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近於墨子之“自苦”；以“分異人爲高”，則又與墨子“兼愛”相違，而近於楊朱“爲我”、莊列“遯世”之說矣；至若





以豁刻自處，尤與關學一派相同。吾觀希臘人安得臣，倡什匿克學派，以絕欲遺世、克己勵行為歸，貧賤驕人，極於任達；而印度婆羅門教，亦以刻厲為真修，殆陳仲、史鱗之流亞也。《荀子》又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僇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按墨翟、宋鉞皆墨家之派也，“上功用、大儉約而僇差等”，即“尚賢”、“節用”、“尚同”、“兼愛”之說。吾觀西人當希臘羅馬時，有斯多噶學派以格致為修身之本，以尚任果重犯難設然諾教人，與《墨子》首列《修身》諸篇，而復列經上下各篇者同一精義，而墨子弟子，亦流為任俠，尤與斯多噶同。至佛教衆生平等之說，耶教愛人如己之言，亦墨翟、宋鉞之流亞也。《荀子》又曰：“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下，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紂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按慎到、田駢，皆由道家人法家，所謂老莊之後為申韓也。其曰“尚法而無法”，“倜然無所歸宿”者，指法家未成學派時言也。然觀“終日言成文典”一言，則已近於申韓任法為治者矣。吾觀西人之學，以法律學為專門。奧斯丁之言曰：“法律者，主權命令之最有力者也。”而德國政治家亦多倡以法制國之說，殆慎到、田駢之流亞也。《荀子》又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案：惠施、鄧析，皆名家之派也。“治怪說，玩琦辭”，即公孫龍“藏三耳”諸說，“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即“由淵平，齊秦襲”之說。吾觀希臘古初有詭辯學派，厥後雅里斯德勒首創論理之學，德樸吉利圖創見塵非真之學，皆與中國名家言相類。若近世培根起於英，笛卡耳起於法，創為實測內籀之說，穆勒本其意，復成《名學》一書，則皆循名責實之學，較之惠施、鄧析，蓋不同矣。又《荀子》於十子之外，復舉子思、孟子，以為失孔子之正傳。夫子思、孟子一派，為中國儒教之宗，與希臘蘇格拉第之學相近，亦諸子學術之合於西儒者也。

周末諸子之書；有學有術。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今西人之書，皆分學與術二種。如陰陽家流，列於九流之一，此指陰陽學之原理言也；陰陽若五行卜筮雜占，列於術數類中，則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又如《管子》、《墨子》各書，卷首數篇大抵皆言學理，而言用世之法者，則大抵列於卷末，亦此義也。若《商君書》諸書，則又舍學而言術者矣，《韓非子》則言法律之理。故於《管子》不同。此亦治諸於學不可不知者也。張南軒之言曰：“上達不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寢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而外，又別有上達也。”其說甚精。蓋下學者，人倫日用之學也，亦即威儀文辭之學也；上達者，則窮理盡性之學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可得聞”者為下學之事，“不可得聞”者為上達之事。下學即西人之

實科，所謂形下爲器也；上達即西儒之哲學，所謂形上爲道也。《大學》言“格物致知”，亦即此意，其曰“致知在格物”者，即上達基於下學之意也。宋儒高談性命，蓋徒知上達而不知下學者也，此其所以流爲空談與。

自秦焚書，五經灰燼。漢除挾書之禁，老師宿儒，始知服習經訓，以應世主之求，然傳經之家，互有不同。近代學者，知漢代經學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如惠氏學派大抵治古文家言，常州學派則治今文家言。吾謂西漢學派，祇有兩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治齊學者，多今文家言；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如《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見《漢書·儒林傳》中。有孟氏學，爲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大約京房爲齊學一派，喜言災異。而東漢所傳，則大抵爲魯學一派，亦有卦氣爻辰之說。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於鼂錯，乃齊人之治《尚書》者也；是爲今文《尚書》。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尚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尚書》者也；是爲《古文尚書》，史公從安國問故，故《史記》多引《古文尚書》。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爲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漢書·匡衡傳》所釋《詩經》皆《齊詩》也。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爲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列女傳》所引之《詩》，皆《魯詩》之義也。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爲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繁露》一書純《公羊》家之言，西漢以《公羊》立於學官，故儒者多治之。《穀梁》爲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見《漢書·劉向傳》。故《新序》、《說苑》諸書亦多《穀梁》家言。而《漢五行志》所言，劉向述《春秋》，皆《穀梁》義也。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西漢之時，傳《禮》學者，以孟卿爲最著，此齊學也；而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兼得逸《禮》，見《儒林傳》及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而古《禮》復得之淹中，亦魯地。則魯學也，是《禮》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如“瓜祭”作“必祭”之類是。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見《漢書》本傳。至張禹刪《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爲一，而《齊論》以亡，近儒戴子高《論語》注則參用齊學。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孝經》亦然，所謂今古文《孝經》，古文即魯學，今文即齊學也。要而論之，子夏傳經，兼傳齊學、魯學者也；荀卿傳經，則大抵多傳魯學。而齊學昌明，則由秦末儒生抱殘守闕；魯學昌明，則由河間獻王、河間獻王爲魯學之專家，觀戴東原《河間獻王傳經考》可見。劉歆見《讓太常博士書》之提倡。齊學尚新奇，故多災異五行之學，《齊詩》“五際”等說，皆齊學之嫡派也。魯學多迂曲。如《穀梁》諸經是也。近世齊學大昌，治經之儒，遂欲尊今文而廢古文。如魏默深、龔定盦、劉申受、宋于庭是也。然魯學之中，亦多前聖微言大義，而發明古訓，亦勝於齊學，豈可廢哉。然齊魯二派，則固判然殊途者矣。

西漢之初，儒學雖萌芽於世，然九流之說猶未盡淪。賈生傳《春秋》、三禮之學，然《過秦論》上篇以仲尼與墨翟並言，其言曰：“陳涉才能不及中庸，非有